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起原因浅析

唐 振 南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

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起原因浅析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从辛亥革命失败后湖南政局对知识界的影响，湖湘文化的发展，新民学会活动特点，毛泽东蔡和森建党思想特色，湖南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真理的追求诸方面进行分析，阐明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起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原因及主观、客观因素。

一、湖南是辛亥革命响应最早的省份，也是失败得最快、最惨的省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湖南先进知识分子中破产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新觉醒，由向西方寻找资产阶级理论武器，转向选择马克思主义。

二、力主变革的湖湘文化，经杨昌济的改造形成一种新型的湖湘文化——新民学会的“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种新型的湖湘文化，激励大批湖南青年奋勇探索，其中朴素的辩证观点、奋斗向上、服从真理的精神，是推动他们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

三、新民学会会员在寻找革命真理中，行程虽很艰难，步履却很扎实，富有独创。第一、富有开放思想；第二、宣传讲求质量，传播注意效果；第三、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第四、注重实践，讲究言行一致；第五、注重与工农结合。新民学会这些特色，对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深远影响。

四、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杰出贡献。思想上建党，主要是指世界观与方法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国情研究，从理论上建党。国情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的具体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无理论创造的关键。

五、近代的湖南是经过多次革命洗礼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农武装起义蓬勃发展的省份。在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后健在的新民学会的骨干，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领袖，二战初期的工农红军指挥员，构成了湖南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六、敢于与旧的观念决裂，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铸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条件。

人们经常议论这样的问题，湖南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这确实值得研究。

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科学分析，才可得出正确的答案。本文拟从辛亥革命后湖南的知识界，湖湘文化的发展，新民学会活动的特色、毛泽东、蔡和森建党思想的特点，湖南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真理的追求诸方面作些分析。

湖南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数经历或目睹了辛亥革命，如林伯渠、徐特立，都是湖南辛亥革命的元老。湖南是辛亥武昌起义响应最早的省份，也是失败得最快、最惨的省份。1911年10月22日，焦达峰、陈作新策动新军起义，宣布湖南脱离清政府独立，焦、陈任正副都督。23日，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强迫焦、陈承认由省咨议局改名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湖南都督府参议院规则》，“规划民军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议会。但是这议会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而是保障立宪派篡夺革命果实，将焦、陈囚如“笼中之鸟”。这还不够，31日，谭延闿唆使武装叛乱，杀害焦、陈，自己登上省都督宝座，随即废弃省议会。然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无法保持政权，很快就被袁世凯派出的汤芑铭代替了。

辛亥革命中湖南人付出了巨大牺牲：陈天华愤激蹈海唤醒民众，杨毓麟跳海自杀献忠魂，姚宏业自沉黄浦江，禹之谟惨死靖洲城。他们的鲜血仅仅换来了一个假共和。特别可悲的是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宋教仁，正当他兴高采烈地鼓吹议会制，进行竞选组阁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殉葬品。宋教仁被谋杀，对湖南知识界震动很大，许多原来参加同盟会、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羞与为伍。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心目中彻底破产了。辛亥革命对徐特立是一个积极参与者，是湖南“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焦、陈起义时，他欢欣雀跃，到处发表政见，鼓吹革命，当选为临时省议会议员，副议长。可是，当他认真执行无产阶级议会的职责，提出知事民选案时，却引起了议会内部的激烈斗争，议长熊兆周勾结官厅，把通过了的知事民选案搁置不理。这对徐特立是一个深刻教训，他在《六十自传》中说：“我希望的民主共和国就成为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①

辛亥革命失败，湖南的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蒙受精神痛苦，而且添增了南北军阀的蹂躏。湖南是南北军阀混战的拉锯战场。湖南人民先后受北洋军阀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统治，又遭南方军阀谭浩明、谭延闿、赵恒惕的践踏。在那战火纷飞、苛捐劫掠并进的岁月，湖南人民苦不堪言。以醴陵为例，张敬尧入湘时，先是南军退出醴陵“首将城中财货钱帛，掳掠一空，复将房屋架梁，烧毁略尽，杀伤遍地，血肉成丘”。北军进城后，又“重燃劫火，大肆诛屠，万家无雄蝶之遗，四处有焦伤之骨。延烧十里，火达数朝，邑城既空，乡僻又起。……及夫战争稍息，又见群盗横行，水无可避之源，山无可栖之穴”此役被焚房屋“城中不下万户，乡间亦数千户，广袤及百余里。”②这仅是醴陵战役一例。北洋军阀在湖南三进三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无以计算。更可恶者，南北军阀拉帮结派相互厮杀，无聊政客，倾轧构陷，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民风败坏，赌徒猖

起，淫风火炽。毛泽东多次描述南北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痛楚和他的心境：“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弟于他事可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③当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于这种黑暗政治进行了揭露，又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省城几所院校徐特立因指斥张敬尧的清乡队骚扰民财，倒被诬为通匪，通令缉拿，不得安居。长沙各校都被军队占领驻扎，学生不能入学，老师不能执教。在北洋军阀残酷迫害下，湖南各界掀起了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湖南知识界发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师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

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之间的混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使湖南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迅速觉醒。第一个觉醒是：中国革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林伯渠回忆，“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常苦恼着我。”^④其中之一，孙中山拼命地向西方学习，可是欧美诸国不支持，不承认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猎取“民国”临时总统后，日、美、英争先恐后承认，并派出使节。在痛苦反思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说都是资本主义扼杀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罪行，充满了中国近代史。第二个觉醒，是意识到社会制度要变革。“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⑤社会制度不变革，军阀统治不推倒，人民没有安宁的日子。特别是压在最低层的工人、农民，苦于战争的苛捐兵役劳役，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在张敬尧督湘时，常宁水口山，平江金矿的产业工人，长沙的码头、泥木、纺织、印刷、人力车工人的自发罢工此起彼伏，未曾平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有文字记载的罢工达44次，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他们迫切要求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湖南造币厂一位工人遭受厂方开除，连声呼喚：“马克思呀！你到我们中国来吗？这种十层地狱里面的日子实在难过呢！”^⑥这悲惨的呼喚，是千百万工人的血泪，也是千百万工人的渴望，结束南北军阀的统治，变革社会制度已成为全湘人民的呼声。第三个觉醒，由向西方寻找真理转向苏俄，转向马克思主义。林伯渠回忆，他在经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多次失败后，“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⑦人们将视线移向北冰洋，林伯渠继续回忆道：“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了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与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⑧毛泽东、蔡和森则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断定今后阶级战争的最终结果，必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第四个觉醒，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思想启蒙。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毛泽东曾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⑨而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是“社会之中坚”，唤醒民众，则为改造社会之关键。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中国的改造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邓中夏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办工会，走向马克思主义。

这种文化传统，就是湖湘文化。湖南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或间接受过这种文化影响。从王船山、魏源、谭嗣同至蔡和森、毛泽东等湖湘文化的“巨子”，都有一种上下求索，立新反旧，主动反静，尊尚变革，勇于进取的探索精神，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有一种以救亡为主线的文化思想，有正直勇毅、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特别是“经世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干学风代代相传、长流不息。这种湖湘文化孕育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志士英雄，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的革命运动。

湖湘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是由杨昌济发初，经毛泽东、蔡和森弘扬，将西方文化与湖湘文化同时改造，形成一种新型的湖湘文化——新民学会的“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

杨昌济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引进者、启蒙者，是一位受到湖湘文化熏陶，又到日本、英国、德国学习，考察十年，掌握了西方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理论的学者。他主张对东方学术和西方学术，采取批判态度。毛泽东曾记载：“怀中立先生言，日本基督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⑩他谆谆教导学生，要将西方的学术和东方的学术改造、结合，创造一种新学派。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杨昌济在哲学上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观，以为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宇宙中的事物“皆吾性分内事”^⑪，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赞扬“心之力”，为毛泽东作文《心之力》记了100分。尤以知行统一的务实精神对学生有影响，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而力行尤为重要。没有力行，博学、深思都是徒劳。特别提倡“坚忍”二字，“以久制胜”。学生称他这个观点为“达化斋的法门”，是杨昌济的法宝。他主张广泛学习，特别要向社会学习，“练达世情皆学问”，^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人之学都要学习。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但这个进化观点，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不适用于一国之内之人民之间。国内人民应是“合群为首要任务”。他以生存竞争思想教育学生，要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以“合群”思想启发学生，要把人民组织起来，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在伦理学上，他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主张理欲合一，人类应有理想、追求，才能上进。但他反对自私自利。当时有人散布“人是自私的动物”，“惟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及”。对此，杨昌济抨击道：此言“可哀可惧！人惟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此种议论，伤心害政，真有烈于洪水猛兽者”。^⑬他教育学生，不仅要为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立大志，而且要实现大志完善其身心，培养同情心、公共心、为社会服务心。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为“公共心之个人主义”，把“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利己”是为了发达自己的身心使其“至善”，达到最美好的境地，“利他”是为社会服务，无私奉献。他主张一个人要有信仰，个人可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不可牺牲自己的信仰。如果牺牲自己的信仰，就会失掉人格，就不可能作出贡

融。佛洛伊德理论，既有西方思想，又有中国文化传统，是中西文化批判改造后的新文化。这些文化思想，对湖南青年，特别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行合一的务实精神，以久制胜的坚韧意志，贯穿了毛泽东一生。

杨昌济对新民学会的影响。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记载：其一，“诸人大多素仰杨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中先生的诸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其二，“这些青年学生在杨昌济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启发下，“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望朋之心热切到万分”^⑩。新民学会最初的21个基本会员，有20个是杨昌济在湖南一师的学生，湖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9个是杨昌济的学生与同事。新民学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纪律，“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的入会条件，“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学会态度，特别是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学风，正与杨昌济一贯的主张吻合，是杨昌济改造过的湖湘文化的精华凝聚。这种湖湘文化凝聚一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奋勇探索，其中朴素的辩证观点，奋斗、向上、服从真理精神是指导他们通向马克思主义的中介，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就是在这种文化思想基础上开始探索的。

新民学会对湖南先进知识分子寻找、选择、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培育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就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蔡和森则有“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建立政党的打算^⑪。因此，学会诞生，立即组织“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寻求革命真理，在寻找革命真理中，行程虽很艰难，步履却很扎实，很有独创性。

第一，富有开放思想。新民学会成立后第一次会议，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确定留法勤工俭学运动^⑫。1920年又发起留俄勤工俭学，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经上海去苏俄。至1920年8月全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300名，湖南占了326名，是人数最多的省份。43岁的徐特立，50岁以上的蔡母葛健豪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可见湖南人寻求革命真理的精神“可谓勇矣”^⑬。

第二，宣传讲求质量，传播注意效果。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直至1922年湖南还有人翻印《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作教材。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成都《星期日》都予以介绍，赞扬该刊“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新格局是：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欧洲的工人运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这种“世界革命”的潮流，任是什么力量都不能阻住。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员会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知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乱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这是毛泽东对

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最早的描述，包含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这个观点，有如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有无限的理论价值，鼓舞了大批湖南青年研究十月革命。

特别值得颂扬的是长沙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独创作用。《文化书社缘起》写道：“一枝新文化的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⑭。书社的主要任务是传播这种新文化，满足“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的湖南青年。这在当年传播新文化的书社中是唯一仅有的公开揭示自己是传播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新文化的书社。书社不仅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组织广大读者学习新思想、新文化。“文化书社同人”向读者作的两个建议：一是介绍、推广新书报，二是组织读书会作“共同的研究”，印成传单，夹在售出的书刊内。这是一个创造性地组织读者的方式，在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行书店中得到推广。当年长沙许多中学生和湖南总工会的工人就在这两个建议启示下，组织了许多读书会。

第三，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新民学会中的部分会员，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就注意捕捉她的精神实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集会讨论方式，获得共同认识。蔡和森在法国组织留法会员讨论，毛泽东在长沙召开新年会议辩论。两个会议讨论的内容，都是新民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的方法及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抓住了各种主义的实质，迅速地辨明了是非。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毛泽东、蔡和森及其战友在两个会议上的发言和通信都把握了这些本质问题。蔡和森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才有“神经中枢”^⑯。毛泽东对于蔡的观点“深表赞成”，“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⑰。列宁能够所以建立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就是因为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上列论述，对建党的必要性，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都作了明确回答，有益于湖南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在党史界已公认，蔡和森是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最早明确党的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我觉得还在三个方面毛、蔡超越了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是党的性质，蔡和森关于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队，神经中枢的论述，是第一次明确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二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可能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只讲到中国有工人阶级，但未提出有立即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可能。社会上的反对派更是说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不能建立工人阶级的党。蔡和森不仅回答有无产阶级，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看质量。西方大工业国家无产阶级常常受资本家的购买而不觉悟；中国工人已三分之二不能生活，一旦觉悟，其力量绝不减于西欧。毛泽东从工人的自发斗争中也看到中国无产者已有因无产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并对蔡和森向他提出的组党建议，作了明确回答：“知了就要行的”^⑱。三是批判修正主义。他们的书信与发言还批判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蔡说：“修正派、

改良派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惟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⑨毛泽东也批判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⑩就我所知，在1920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中如此明确地批判修正主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者，要称毛、蔡二人最早了。由此可知，湖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时，就有较好的理论基础。

第四，注重实践、讲究言行合一。蔡和森说：“第觉立己立人，划分先后之阶段者，谬也！为学为事，划分先后之阶段者，尤谬也！”^⑪进学与兼事，储才与练习结合，主张学中用，用中学，学用结合。毛泽东更加强调理论要与实践结合，“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⑫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及其新民学会会员们先后投入和领导了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并将五四运动发展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这种依靠群众和利用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成功地赶走盘踞一个省的北洋军阀，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驱张”胜利后，顺应全省人民废督、自治的愿望，新民学会又发动了湖南人民自治运动。“驱张”、“自治”都不是毛泽东等人的根本目的，而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环境，以便“从事于根本改造”，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这些斗争，使湖南青年学生，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会会员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党培养了干部。

第六，注重与工农相结合。新民学会很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群众中去，并以此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即刻着手”方法。其具体作法：一是“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文化书社营业员陈子博经常背着新书报，深入工厂销售，并向工人讲解书报内容；二是“夜学要多办”，毛泽东、陈昌等自1917年底以后至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几乎未曾中断过工人夜学教育。三是“自己到劳动界去”体验生活，^⑬张昆弟、罗学瓚、郭亮、夏曦等在建党前后就养成了与工人打成一片的好习惯，罗学瓚还同人力车工人对换位置，体验拉人力车的滋味呢！

新民学会自始至终坚持“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的入会条件；会员之间砥砺品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依赖旧势力，找真同志；有严明的纪律；有潜在切实的作风；注重理论学习、理论探讨；特别重视实践、勇于实验；有创新、互助及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优良作风，对我们党造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深远影响。新民学会有会员75人，其中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29人。这29人中无产阶级革命家9名，烈士12名，无一叛变者。

四

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杰出贡献。湖南成长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毛泽东、重视党的思想建设、注重干部教育、劳动教育密不可分。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产业工人是沧海之粟，农民是汪洋大海，在这样的社会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自然思想上入党比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了。

思想上入党主要是指世界观与方法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毛泽东从准备建党之日起就重视思想建设,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5]凡加入共产党者,都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包括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断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26]即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27]包括实事求是,提倡“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28]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与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毛泽东还主张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1年1月28日,他给彭璜信提出:同志之间“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湖南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湖南产业工人根少、党员成份中,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出身的最多,但湖南党组织能坚持对农民、手工业出身的党员给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注重党内思想教育,从而保障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在1925年底之前入党的,湖南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至今没有发现一个叛逃者。

思想上入党,除主观努力,自觉改造外,还要靠组织教育,灌输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前,毛泽东曾致信蔡和森,专论“才财学三事”力举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蔡和森很赞成毛泽东的见解,并以胡林翼不及曾国藩的业绩伟大,“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29]为历史借鉴,建议毛泽东及早抓干部培养。毛泽东早有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随即将此计划付诸实践,于1921年8月,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重视理论探索与理论修养。它的办学宗旨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因此,招生条件上,强调“对于人生观的主张”。“对于社会的批评”;教学方法上提倡“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国情、省情和当时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认识党的纲领、战略、策略和解决党员、团员的世界观,提高党团员的分析能力。

为实现办学宗旨,自修大学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从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保存的书刊目录看,当年学员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工钱劳动与资本》、《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即《资本论》第1卷第6篇)、《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学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有《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资本论》等。当时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原著中译本,他们都阅读了。

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国情研究,从理论上建党。国情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前提,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的具体体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本功夫。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尤需要结合本国的实际“独立地探索马克思主义

理论”。^[30]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这个教导，有注意国情研究的传统。1920年，毛泽东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31]中国共产党建立前，毛泽东、蔡和森等分别结伴作过的农村调查约有四次左右，足迹遍及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浏阳、醴陵、萍乡、岳州及洞庭滨湖诸县。在工厂、矿山的调查，则是无法统计了。除了现实的工、农业生产状况、生活状况、阶级状况、民情风俗的调查外，还有历史、文物典章制度的调查，毛泽东也是十分注意的。当时毛泽东没有赴法赴俄勤工俭学，为的是作好这类调查。后来，他领导湖南工人运动中考察安源煤矿，领导全国农民运动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中作兴国调查、寻邬调查等等，都为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准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的杰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形成的标志。《反对本本主义》指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观点、结论，是我们了解国情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与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国情”的提出，体现了毛泽东的理论勇气，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个观点是很不容易的。《反对本本主义》标志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是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

在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除毛泽东是国情研究的楷模外，应称邓中夏了。邓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很注意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他从香港海员、京汉、粤汉、开滦等处的工人运动，浙江萧山、江西萍乡、广东海陆丰、湖南衡山农民运动中总结经验，论证了中国工人阶级是“最勇敢的先锋队”^[32]“将来中国社会革命的领袖固然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领袖亦是无产阶级。”^[33]“农民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他们受大地主的剥削与压迫，我们是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所以他们的经济痛苦与我们原无两样。至于受军阀官僚们的无情蹂躏，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他们与我们政治痛苦更是一致了。”^[34]由于他重视国情研究，深悉国情，从而成为全党最先提出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从毛、蔡、邓等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重视国情研究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情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无理论创造的关键。没有这一条，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不能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提出。

五

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引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也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35]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深刻的革命，也是历史上

最艰难。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它必然锤炼出伟大人物。中国人民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必须要有杰出的领袖，还要形成一个领袖群，才能组织领导指挥这场复杂、艰苦、曲折的革命。

我们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毛泽东成为我们党的领袖，是在我们党同敌人的残酷斗争中，是在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斗争中，是在无数的挫折、失败、成功、胜利的过程中，反复比较选择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徐特立，是经过了漫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千锤百炼而成长的。

由于旧中国军阀割据，各省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发展也不平衡。有些省份阶级矛盾尖锐些，群众的阶级斗争激烈些。有些省因其他原因，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缓和些。有时又因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革命中心发生转移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各地革命家的产生成长发生变化，出现不平衡。

湖南虽然是一个内陆省，但接近广东，是中西文化撞击地域。中国近代史上几次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湖南都是冲击剧烈的区域，是经过多次革命洗礼的地区，不仅锻炼了人们的革命意志，激励人民奋发向上、勇于革命的精神，同时每一次革命多多少少打击了封建势力，引起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引起一部分“书香门弟”、官僚地主的破产。湖南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林伯渠、邓中夏、李六如等的家庭，在清代末年都“相当优裕”，但到民国初年没落了。他们亲身感到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必须变革了。马克思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36]湖南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十月革命潮流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状况下，冲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归向马克思主义的。

湖南在近代是南北军阀争夺的战场，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远比他省凄惨。军阀混战的祸害前已叙述，此处补述军阀的横征暴敛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以赵恒惕统治期间为例，每月军费、政费高达百余万元，而湖南财政每月收入不过40万元，省库奇绌。于是预征田赋、增加苛捐，田赋由1925年预征至1929年，郴县还预征到1930年。全省每年田赋360万元外，增加亩捐、特捐高达1000万元以上。地主豪绅则乘机搜括，地租由五成、六成增至八成、九成，甚至还有“铁租”，规定“丰歉不得加减，如滑耕字载明是10担，秋收只收8担，佃户必须赔租两担。”^[37]地主的残酷勒索，导致农民破产，土地日益集中，如资本家兼地主的聂云台拥田10余万亩，新化陈姓军阀有田50万亩。农民在残酷剥削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牢牢”，就是这种窘困的写照。许多破产农民流入城市矿山，出卖苦力或从事手工业。湖南的工矿业和手工业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民，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同样过着惨不忍闻的生活。压迫愈深，反抗愈大，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湖南就像布满了干柴，有一颗火星，就可生出熊熊烈火。当年贫苦工农流传许多串连革命的歌谣：“百条大路百条通，十人就有九人穷，几个穷人团结紧，何愁革命不成功”。^[38]“头颅可以抛，意志不动摇；杀了我一个，大伙把仇报。”^[39]湖南许多革命先烈，就是出身贫苦工农，

投身革命，抛头洒血的。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在这些血海里泡大成长的。

湖南是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展较好的省份，也是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区域，更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武装起义蓬勃发展的根据地。湖南自第一次工运高潮始，直至1930年，革命运动几乎没有消沉期，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直至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湖南都是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在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第一次工运高潮中，涌现了邓中夏、刘少奇、郭亮、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湖南农村大革命中成长了夏明翰、柳直荀、罗学瓚、潘心源等农运领袖，在武装起义和长期的军事斗争中造就了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肖劲光、粟裕、谭政、许光达、杨得志、王震、肖克等将帅，在长期的党政军事斗争中选拔了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何叔衡、李维汉、李富春、蔡畅、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王首道等治党治国元勋。解放后健在的新民学会的骨干，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群众运动的领袖，二战初期的工农红军指挥员，构成了湖南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者，人民最敬爱的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走的是一条从南到北的路，直到红军长征后，革命的中心才转到北方，这是造成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数出身南方，湖南成为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主要成长区域的又一原因。

六

前面分析了孕育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社会、文化传统因素，分析了毛泽东、蔡和森建党的特征，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用。但谁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这还有一个主观因素。

马、恩曾经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0〕}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论述“共产主义革命”，指的是革命运动，不是指一个人，但也包括了参加这个革命运动的每个成员。“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彻底决裂，消灭私有制，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包括陈旧的思想理论、家庭观念、私有观念、名利思想，生死观念，人生态度等等实行彻底决裂。一个革命者能否始终追随革命，能否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还要看自己对待传统观念能否敢于决裂，还要看自己的主观努力。

每个人都要改造，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毛泽东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有过奇趣的旅程。他最初是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从爱国爱民思想出发，为了救国，他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相信他们的改良主义；他敬仰孙中山，相信过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满腔热情地参加辛亥革命，当了一名普通列兵；他受杨昌济的哲学、伦理思想熏染，倾向过主观唯心主义。他对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感兴趣，希望中国也出现这样的伟人，“以洗滌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41〕}他对胡适有过钦佩，赞其“实验主义”可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作过研究，认为他的思想比马克思“更广、更深远”；^{〔42〕}他对新村主义有过追求，曾组织

工谈会，在岳麓山作过试验；他热衷于湖南自治，还幻想过建立“湖南共和国”，实现湖南人民自治。他的思想曾是自由主义、乌托邦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但是，他主张“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64]不断地除旧布新，与旧思想决裂，逐步发展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许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敢于与旧观念决裂的典范，如林伯渠、徐特立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彭德怀、贺龙由旧军队的团长、军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刘少奇、任弼时由信仰“实业救国论”者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何叔衡、谢觉哉由“反封建的秀才”经激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这里都有过艰辛的历程，思想的苦闷。他们不仅要同旧的政治思想决裂，还要同旧的观念决裂。林、徐、彭、贺原来都有高官厚禄，却放弃不享，而要提着脑袋干革命。邓中夏宁肯与父亲断绝联系，也不接受他父亲花钱为他买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的委任状。这股力量那里来？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来源于对人民的忠诚。人人都能背诵的夏明翰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集中地表达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邓中夏的《狱中遗言》：“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44]这份遗言概括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观。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可能铸成无产阶级革命家。

湖南有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湖南人民的光荣，是湖南人民的骄傲。但我们不能躺在前辈的光荣簿上，享受这种荣耀。我们要象他们一样，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沿着他们开辟的航道奋勇前进，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彼岸。

注 释：

(1) 徐特立：《六十自传》

(2) 《湘灾经略》第1卷第336—338页

(3)(5)(8)(9)(10)(23)(26)(27)(28)(31)(41)(42)(4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5、454、389、86、517、353、519、363、474、639、341、87页。

(4)(6)林伯渠《六十自传》，载《林伯渠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

(5) 1921年2月25日湖南《大公报》

(10)杨昌济《论语类钞》

(11)转引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

(12)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

(13)(15)(18)(21)(24)(25)《新民学会资料》，第2、5、148、23、28、162页。

(14)(17)(20)(22)(29)《蔡和森文集》第13—14、49—63、59、64、14、13页。

(16)《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1卷第86页

(30)《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32)(33)(34)《邓中夏文集》第42、10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 (36)、(40)《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272页
- (44)、《革命烈士书信》(续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 (37)《农民问题丛刊》第4期
- (38)、(39)《湖南革命歌谣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0、164页。